

# 李烈鈞失意始末

## 馬五先生

民黨元戎李協和上將軍，自民國肇建，迄孫中山先生下世止，聲華藉甚，名震中外。迨民國十七年後，乃鬱鬱不得志，晚年更落寞，臥病於重慶歌樂山之雲頂路寓所，溘然長逝，身後淒涼，幾無人憶及此一代革命英雄之下場矣！

李一生受知於國父孫公，亦唯孫公乃足以駕馭李氏，棄短取長，倚畀弗衰。孫公深悉其善將將，能用兵，而拙於治軍，故每遇北伐討逆之役，輒以李氏居統帥或前敵總指揮之任，事畢，即改任參謀總長等職，不復掌理兵事矣。孫公於民國十四年辭塵北都，李自付南中無復游刃之餘地，蓋是時廣州革命陣營由胡漢民代大元帥職權，李胡素不睦也。適馮玉祥開府塞北張家口，野心勃勃，卑詞厚禮，欲挾民黨要員以自重，擬請戴季陶任幕僚長，聘李氏為其全軍總監，戴婉却，而李與鈕永建方聲濤等應邀出塞，旨在策動馮氏加入民黨革命行列，潛植實力於幽燕。然馮之內心，則在利用民黨人員以增加聲勢耳。假使馮軍當年不為吳佩孚張作霖合力圍攻，逼退甘肅，蹙蹙騰騰，馮氏始終將以北洋軍閥系統，稱雄燕趙

，不致投向革命旗幟下，乃可斷言。余為當年追隨李上將出塞者，其中詳細經緯，固知之稔也。

李在馮軍中經年，所志未酬，而胡漢民因廖仲愷被刺案，已被迫離粵，發配莫斯科，汪精衛繼起執政，汪李間相處尚不惡，李乃與昆朋圖南之念，別馮於庫倫，經西伯利亞，遶海而南，至於粵。時國民革命軍尚未動員北伐，譚延闓漸居黨政中堅領導地位，李與譚交誼本稠疊，而馮玉祥自甘肅來電，聲明全軍上下集體加入國民黨，譚氏乃盛稱「此為協和奇功」，推李為國府委員。旋李回贛奔母喪，未幾，革命軍分下湘贛，譚氏又堅推李主政江西，此為李氏平生最後一次之得意時期，泊餘即逐漸入於黯淡之境矣。

李氏晚景之光芒遂散，半由於人緣，半基於個性，據民黨長老所言，李與胡漢民交惡，源於民十二年陳炯明被逐出廣州之際。維時孫公尙居滬上，首遣李入粵收拾炯明敗軍洪兆麟諸部，以及其他僞粵境之雜軍如賴世璜等，統由李以「粵閩邊防督辦」名義，節制指揮，繼又命李暫代行大元帥職權，聲勢極煇赫。滬上黨人以李素綰

兵符，鮮預政事，乞孫公加派胡漢民入粵相助為理。胡氏約同湘籍老黨人譚石屏（人鳳）同赴粵，先往謁李，詎李以事忙却見。胡譚在民黨資歷地位不下於李，年事且較李為高，受此刺激，大為忿忿，謂總理亦未有如此詆詆拒同志於門外之非禮態度也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譚即回滬，不再涉身現實政治，胡氏係受命入粵者，未便拂袖去，而胸襟又偏窄，銜李尤甚，迨孫公回粵，胡為幕僚長，參預密勿：李亦解兵柄，拜參謀總長命，越民國十三年，即參謀總長亦不復安於位，孫公命李以特使名義赴日本與彼邦在野黨聯絡，李乃被排去粵矣。

當黃埔軍校籌建時，今總統蔣先生尙在蘇俄考察，孫公會派李氏暫負籌備之責。蓋以李為在任之參謀總長，創立軍官學校，亦為參謀總部職份內事，故孫公依體制而行，然胡力陳不可，謂李素不長於軍事教育也。李之不安於位，殆以此故。

李居日本兩月，孫公應段祺瑞之約，北上協商國是，道經日境神戶，命李隨行，此時曹錕被

因，北都新組政府，黃郛為攝政內閣總理，任李為參謀總長，李不表示去就意。既抵北都，知段祺瑞不能接納孫公主張，惡之，拒不就新職，孫公逝世後，亦不與段接近。李告余：彼留北都時，曾晤段一面，但言談殊不投洽云。李於大節始終不虧，即此可概見也。

民國十六年春，國共兩爭表面化，寧漢對峙，李反共意志甚堅決，不受徐謙等人之游說誘惑。武漢政府下令免其江西省主席職，而由南昌公安局長兼漢軍朱培德部教導團團長朱德，策動反李風潮，迫使離職。時南京已公開揭出反共旗號，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事，新組政府。今總統蔣先生對李頗推崇，迎之入京，請李就陸軍參謀兩部任擇其一，即日組織成立而主持之，然李示消極意，旋被選任為國務院五常委之一，實則由李氏綜理一切，蓋其他四常委為胡漢民、蔡元培、于右任、汪精衛等，胡專主黨務，蔡精教育，汪在武漢，于留陝西，而譚延闓亦羈漢口未來也。

夏七月，革命軍總司令蔣公突通電下野，胡漢民亦去京。蔣公回至奉化，密電李告以動靜，並謂已在上海祁齊路黃郛寓中設置電臺，如有見教，希交黃寓轉遞可也。當時余為李司記室之役，於譯呈蔣公來電之際，乘間啓言：「蔣先生被迫下野，胡先生亦離京共進退，公為表示不與共方妥協，兼以顧全私人道義，似可赴滬上暫居觀變，得暇且不妨往奉化一遊也」。李佛然答謂：「介石下野，事先毫無所聞，如此重大決策，竟不我語，足見其並未視我為真朋友，我又何必自作多情耶？」余以青年晚輩，未便喋喋強聒矣。

既而程潛李宗仁、朱培德、白崇禧等大將皆

聯袂入京，商寧漢合作大計，創立「黨政軍聯席會議」，公推李協公為主席，李欣然就任，一切善後措施，多遷就武漢方面意旨，即間接不利於蔣公也。旋譚延闓來自武漢，仍任國務院主席，李亦居國務院常務職如故，譚對府務多不問，讓李處置，譚李交誼本厚，而程潛李宗仁等又皆出京返至軍次，準備繼續北伐，胡漢民隱居上海，不預南京新局面事，蔣公亦出國赴日本矣。李對當前大勢不予辨析，而其內心深處，對蔣公復有以前輩自居，不甘屈從之下意識潛在，此為其晚年失意最大因素也。

民國十六年冬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大會於上海，以迎蔣總司令歸國復職事為主要課題，汪精衛且率先領銜發佈「擁護蔣總司令復職」建議文字。留京中委獨李氏拒不預會，復電上海謂：「嘉之會也，善莫大焉。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，不預於會，亦無惜焉」。意在鄙薄汪精衛之二三其德，蓋與為伍，然忌者則謂其為反對蔣總司令復職也。迨蔣先生入京，李亦未出迎，次日，蔣赴國府叩訪，李笑謂：「我替你看家，恭候大駕回來」，頗有老氣橫秋之態。

十七年春，蔣總司令決定揮戈北伐，將軍收復燕趙，統一關外。以李會居北地有日，為北方軍人所崇敬，與閻錫山私交尤厚，乞李屈任革命軍參謀長名義，同行北上，藉資號召，且言：「我不敢請前輩作參謀長，但乞指導一切而已」，情詞殊懇摯，李婉謝。蔣於出發督師之先日黎明，又微服簡從，赴高樓門李氏寓邸作最後之勸駕，入李宅，侍者告以李委員尚高臥未起，蔣先生急囑勿遽驚醒李，即在客室坐候，越數刻，李出

見，蔣仍申前請，盼李只赴前線視察一次，即可回京，固不必常留軍中也。又謂：「此次北伐，祇許成功，我自覺聲望不够，故望前輩為黨前途計，辛苦一輪，匡我不逮」，李謙辭如故。九時，蔣至丁家橋中央黨部開會，席間報告即將出發北上督戰諸有關計劃後，慨然曰：「北伐大業並非我蔣某人的私事，本黨同志應該各盡所能，為完成黨國革命任務而悉力以赴之，才是道理」。殆因連日挽李氏同行北伐而被拒一事，不能釋然於懷，乃有此牢騷語也。

蔣總司令復職後，胡漢民同時入京，仍主持黨務，譚延闓仍任國務院主席，汪精衛雖有擁戴功，然不理於眾口，且胡氏既來，汪即鮮游刃之餘地矣。胡汪素不投洽，黨政首領地位已由胡譚分踞之，汪唯有黯然神傷，託病隱。李則與譚協理政事，意與殊不淺也。

民國十七年夏末，北伐軍事結束，全國大一統，中樞政治軍事皆重新佈署，改組國府，成立五院，網羅各方人物，馮玉祥入京受任行政院副院長兼陸軍署長，閻錫山亦派趙戴文參預政府，長內政部，其他國民黨中央委員皆有職位安置，獨對李協和先生無下文。馮玉祥與李交厚，甚不平，曾以親筆長函，命薛篤弼持往謁蔣總司令面呈之，蔣謂：「我無絲毫意見，可就商於胡展堂先生」。馮以去年蔣總司令下野時，曾被胡氏電責其「一柱擎天」，不無介介，且以胡氏不假顏色，殊難堪也。乃請譚延闓主持公道，為李說項，譚固素善李者，諾焉。

越日，國民黨中常會召開時，譚即席提議曰：「此次政府改組，各方同志皆有安排，唯李協

和同志一人向隅。協和過去對革命勞績，世所共見者，即去夏孫傳芳張宗昌等反動軍閥渡江進犯首都之役，如非協和同志坐鎮此間，從容應付，恐吾人今日已不能集會於茲矣，本黨似不宜健忘斯人也」。胡漢民即答言：「此人尙可用乎？去年南京復成橋慘案，本黨不追究其責任，已屬寬厚，決不能再加任使也」。衆嘿然，譚議遂不果行。

所謂復成橋慘案者，原係國民黨某派人士爲反對當時之「特別委員會」，策動南京學生羣衆，大舉集會，游行示威，於復成橋畔與軍警發生衝突，開槍格鬥，傷斃二命之一樁公案也。李當時聞訊震怒，據報有國府秘書處職員陳某爲煽演慘劇之人，即下令逮捕，擬予槍決示儆。李非「特委會」主持人，鮮預黨務，而慘劇發生後，又力主懲兇恤死，指李爲禍首，殆欲加之罪，以資傾軋排斥耳。

李既遭擯棄，眞所謂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



李烈鈞氏畫像

憔悴」也矣。即日携家離京赴滬，臨發，親友至下關車站送別者，當代文武要人中，僅海軍界之揚樹莊陳紹寬二人而已。政治上之炎涼世態若是，寧不可嘆可鄙耶？

李氏被排斥出京後，初居上海，繼隱匡廬，旋回武寧原籍。蔣公知其清貧，不時餽以生活資用，爲數頗可觀，然李素性不慣積財，鉅金到手輒分別支耗垂盡。寄寓廬山時，倡修九江至山麓蓮花鎮公路，迨歸故鄉，又主辦電燈廠，開公園，除四向饋資，並將連年蔣公所贈貽生活費之餘數投斥外，尙挪移縣有公帑若干，李以當時主持贛政者，乃其舊時素所推信任之部屬，認爲耗縣款於公益事業，必可核銷也。不料縣令列報備核後，省府竟飭如數賠償，使李尷尬難堪，迫而離鄉，重至滬濱栖遲。政治上之炎涼世態，有如是夫！

嗣後內亂頻乘，反側者皆以李氏既不得志於中樞，競欲利用，然李僅虛與委蛇，不屑同流也，民十九年汪精衛在本地倡「擴大會議」以抗南京之際，派代表資金南來，促李即日北上，適余由京赴滬，悉其情，詢李是否應邀而去？彼謂：「我隨總理革命數十年，到今日猶與後生輩如陳公博之流，辯論黨政是非得失，無謂甚矣！」終弗應，代表雖坐李寓苦勸，迄不爲動。一日，李約余偕游法租界公園，席地談國事，彼慨然曰：「吾平生不欲植黨營私，又不願參加他人之派系中，踽踽獨行，宜其失敗，然衷心固無所怨尤也」。余叩以可否重復軍旅生活，以期自創力量耶？彼笑

謂：「君文人，未諳此道，軍人如久離部隊，生活習慣皆丕變，精神大異昔時，不復能堪握甲荷甬之役矣」。

西安事變後，張學良入京請罪，國府令組軍法會審，任李爲審判長。旋以張係二級上將，而李亦僅級二級上將在案，殊乖體制，資夜下令晉升李爲一級上將焉。事後李嗤然語余曰：「張學良給我升了一次官」！李氏於十餘年前，即已位居革命軍大元帥府參謀總長，且曾代行大元帥職權；黎元洪正位總統時，亦曾授以勳一位陸軍上將。詎至革命成功後，竟與張學良輩同其軍階，即此足徵吾黨政府之不尊重歷史與革命績業也，豈勝慨歎！

中日戰爭勃發，李携家南至香港，太平洋之戰起，倉皇逃入內地，而不及挈取其交藏於港銀行保險庫中之僅有首飾古玩等品物，日軍所派「香港總督」磯谷廉介，曾與李士官同學，乃登報請李派員來港洽領存物，李夫人聞訊大喜過望，李氏語之曰：國破家亡，物於何有？設使中國終能存在，此蔑蔑者奚愁難再得乎？否則嗟來之食，徒增恥辱耳。卒置不顧，然生計日益艱窘矣。

維時我政府已撤至巴蜀，滇省爲通達國際路線之唯一衝要地區，龍雲對抗戰意旨如何，殊不可測，中樞爲安定大後方針，初挽李根源回滇息居，繼請李協和僑寓昆明。蓋二李皆爲滇軍老將，協和又曾主雲南講武堂，與唐繼堯交誼深切，龍雲係唐氏衛士出身，其部屬軍官非唐之舊部，即講武堂學生，有二李在滇，足以肆應各界，穩定大局也。協和先生旅居昆明逾年餘，龍對之表面甚尊敬，然李仍以前輩意態應之，從未赴龍處

有所周旋，龍殊不慊於懷。當李氏離滇回蜀時，龍揚言協和先生如親來道別，將奉以豐厚贖儀，用表敬意，然李臨行僅派員持名片向龍告辭而已。

李回至重慶，固無資力營住宅，而政府亦未能照顧，乃潛居歌樂山頂之馮玉祥私邸中，時已病癱，頗不良於行。民國卅一年春初，余往叩謁

，李見面即疊聲謂余「老了，老了」不置，留餐敘舊，依依難捨，知其意境蕭瑟，瀕近人生旅途終點矣：卅二年秋，國府舉行慶典，黨政文武大員畢集，李自郊區扶病踰預會，執事者竟使其屈坐於偏隅末席中，無與語者，然程潛張治中輩，則昂然據高位，意氣非凡，視此革命老英雄如無物，不屑一顧也。適于右翁來，驀觀李，即連

言「協和怎末坐在這兒？」急扶其趨入上座。老輩風範始終葆持革命黨人之氣節，不以窮通榮瘁易其所守者，于翁而外，今世滔滔，顧安見耶？越卅三年春，李以貧病交加，長眠不起，一代風雲人物，晚景頹唐，畢命他鄉，與草木同腐，吾述至此，不禁擲筆太息，泪盈於眶矣！

（摘自詹詹錄）

## 寫在蔚藍色的地中海之前

王成聖

一九四一年——四三年的「北非戰役」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局的轉捩點；其間，由德將隆美爾元帥在地中海南岸攻勢之被阻於埃及西沙漠，而英將蒙哥馬利元帥揮師轉移攻勢，乘「阿拉敏會戰」大捷，追擊德軍長驅直入突尼西亞，以至於英、美兩軍會師，獲致了「突尼斯會戰」的輝煌殲滅戰果。從此，德軍便告一蹶不振。「北非戰役」可以說是一九四四年盟軍登諾曼第，發起反攻歐陸戰役的前奏曲，其對於第二次大戰的全盤戰局，對於世界人類文明的存亡絕續，是具有不同凡響歷史性意義的。

當一九四二（民國卅一年）年八月間，英第八軍團在「阿拉敏會戰」一役大獲全勝的時候，我軍事最高當局洞答「北非戰役」的決定性意義，當即於一九四三年（民國卅二年）三月中旬，派遣一個由陸、空軍軍官各二員組成

的「北非觀戰團」，前往北非戰地盟軍部隊，實地觀察現代戰爭的推演，俾作我整軍建軍的借鏡。這是我國建軍以來的空前創舉。該團於一百卅三日內，完成了一萬七千英里的考察旅行全程，在地中海南岸遍歷了「北非戰役」的每個戰場，躬逢其盛地身臨目親了「突尼斯會戰」的全部經過。本書作者劉方矩將軍（我當時官階為陸軍砲兵上校），便是這個觀戰團的四位團員之一。

劉將軍根據參觀旅行期間逐日記載的日記，撰成這部廿萬言的著述。抗戰勝利後，劉將軍奉派出任我國駐伊朗陸軍武官，出國前曾有書局多家向劉將軍洽商出版事宜，惟值中共倡亂期間，該書尚未問世，大陸河山即告變色。原稿幸能及時攜出。中外雜誌特商請劉將軍，就其保存之底稿，重新校訂改寫，自第三卷第一期起連載發表，將此一二二次大戰的重要史實

，公之於國人。

全書係以日記體裁撰寫，在全部亦莊亦諧的內容裏，有北非戰地實況的敘述，有中東及北非風土人情的素描，有觀戰團四位國軍軍官旅途生活穿插。這部作品是遊記，是戰史，是輕鬆的文藝小品，也是莊嚴的敘事文章。我在瀏覽全書原稿的時候，彷彿嗅到了兵凶戰危的火藥氣息，看到了地中海上盪漾的萬頃碧波，聽到了非洲沙漠裏的午夜狼嗥。諸如艾森豪、亞歷山大、蒙哥馬利、吉羅德、泰德、肯寧漢……這些二次大戰期間叱咤風雲的盟軍名將丰采，都曾出現在本書的字裏行間。

本書作者劉方矩將軍，積卅餘年的譯述經驗，他的作品譯筆之流暢而生動傳神，早經在三軍讀者中膾炙人口，享譽軍事出版界。本書是他生平的第一部創作性文章，想必為愛好劉將軍譯作的海內外讀者諸君所引以先觀為快的。